

8.

超越「左」、「右」，實說實話 ——從財稅政策看科學發展觀

一、問題的提出

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兩位重量級人物，前副院長劉國光、劉吉為代表，一場震驚中外的大爭論曠日持久，從網上和主流媒體反映看，兩軍對壘，陣線分明。大辯論告訴我們，不爭論的時代確已一去不復返了。爭論的雙方劍拔弩張，爭論言辭振聾發聵，雙方觀點非此即彼，二律背反，大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之勢。反思改革和堅持改革的背後，仍是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不是偽問題，而是28年來改革開放的核心，也是建國57年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核心。我總是想起杜潤生杜老的一句口頭語：難道我們就不能先回到起點，回到我們的老祖宗那裡，把最基本的東西搞明確、論明白，然後再看發展道路，再辯創新理論？

馬克思認為，我們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也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最發達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入口處。資本主義是國際的，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祇能是國際的，而且祇有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經過一個過渡時期，才有可能建立「半國家」，「非政治國家」，即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¹ 這種「徹底消滅私有

制」，「兩徹底決裂的」社會主義社會，自馬克思主義誕生的150多年的實踐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馬克思主義沒有戰勝資本主義，但它從根本上改造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軌跡。

列寧與他的戰友托洛斯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斯大林達成一個基本共識：由於帝國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中最落後的俄國無產階級以「和平、土地、麵包」的口號為號召，意外地首先奪取政權。「但是，落後的俄國可以一國取得勝利，但一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他們一致認為「如果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發生革命，俄國革命注定會失敗」。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況下，列寧提出延長「過渡時間」的「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本質，說穿了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尤其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體的多種資本主義成份共同發展。列寧在最後一篇著作中指出：新經濟政策的執行，使社會民主黨人和孟什維克高興萬分，他們說現在列寧和我們一樣了，發展資本主義了，本來就祇能進行資本主義革命。列寧回答說，畏首畏尾的資產階級的走狗們一竅不通，新經濟政策的過渡時期是我們在落後的俄國，找到了團結億萬小農通過合作制（流通領域）與國家資本主義相結合為未來建設社會主義，找到了最好的過渡形式和中間環節。如果他們敢於從國外跑回來，宣傳這套胡說，我們將以「槍斃」來回答他們。² 列寧這樣的論述，貫穿於十月革命後，《列寧全集》32~36卷始終。

斯大林於1928年之前與列寧是一致的。由於帝國主義在全球佔絕對統治地位的巨大壓力，由於為重工業與軍工高速度發展需要積累而集體化，他宣佈「俄國不但可以一國奪取政權，而且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一國建成論徹底改變了馬列的社會主義國際論，布哈林和托洛斯基早在70多年前就預言，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在國內祇能演進為「官僚權貴資本主義國家」，在國際上，祇能按世界帝國主

義規則玩下去，最後演變成「社會帝國主義」，最終「四分五裂」。至今，國際共運權威高放教授，在2006年評價斯大林時，仍十分痛苦而矛盾地宣稱：「在將蘇聯建成世界強國上，斯大林功大於過，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斯大林過大於功」。

中共七大前後，毛澤東、劉少奇非常一致。在近年中央文獻研究室解密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毛劉周共同參與的《共同綱領》和過去未公開的毛澤東在七大講話的內容，概而言之：一句話，新民主主義時代，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一百年的資本主義，擠進先進國家的行列，然後才有社會主義。³

鄧小平這位智慧老人，他對毛劉曾為中國設想的制度路徑，成竹在胸。他絕頂的哲思是「不爭論」。不爭論決不是不思考，鄧六次講過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還講不清楚。他提出的發展的硬道理，強調的是機會稍縱即逝，蘇美爭霸，蘇聯不行，他心如明鏡。一旦一超獨霸，國際形勢就會逆轉。但他提出的不爭論是有言在先的，一是「今後中國富強之後解決兩極分化比改革開放還難」；二是「到2049年之前，中國都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⁴這就是「一百年不動搖」的真正依據，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基石。

馬列毛鄧的立足點都是國際大環境與國內小環境的與時維新，不爭論是因為太清楚，太明白，不用爭。中國的國體，表現在五星紅旗上，一顆大星是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之中，有一顆是資產階級或稱之為資本主義，沒有這顆小星不行，這顆小星若成為大星，中國的流血革命豈不都白革了。針對眼前那些不是偽問題的大問題，以及貌似大問題的偽問題，恐怕必須該爭個清楚了。從這個角度上說，杜老的話一針見血。

從1928年開始，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這種爭論從未

停止過。毛澤東的悲劇「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基本路線，在理論上，一方面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根本對立，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是資本主義，希望避免、繞過、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問題，存在著過渡性質，存在著資本主義性質。文革左得沒邊了，還要進一步「限制資本主義法權」、「八級工資制」、「和資本主義差不多」。因此，總是搖擺於理論上消滅資本主義和實踐上不能消滅之間，提出限制，但又找不到限制的界線。消滅限制資本主義的結果，不但不能消滅限制資本主義，反而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是特別落後形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文革與蘇聯解體、東歐易幟，是兩個極端的教訓。

二、為什麼「公共財政」總是名不副實

金仁慶同志曾預測，中國的稅收在2010年達到三萬億元，奇蹟是2005年中國稅收已超過三萬億。從2006年上半年的情況看，2006年稅收再增長6000~7000億元已不在話下。但是，近年來，貧困人群深感「公共產品」嚴重的供給不足，且高收費一直是嚴峻的社會問題，要扭轉這一困局仍然面臨公共開支的約束，關山難渡雄關如鐵。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公共支出的重心應從經濟建設支出轉向教育、科技、醫療衛生與福利等支出，這方面的支出增長應大大超過其他方面的增長。但是，實踐的結果，許多過去由國有企事業單位承擔的公共支出責任，在企事業單位進行市場化改革後轉嫁給了個人。

中國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始於1998年。中央一再宣示：從1998年開始，財政體制從「建設性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但與此相悖的是，從1998~2005年期間，全國財

政在教育、科學和醫療衛生領域的支出比重不昇反降，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數據證實了這個讓人難以理解的現實：1998年，全國財政支出中用於教育的比重為13.1%，科技支出為3.3%，衛生支出為3.8%，三項支出合計所佔比重為20.2%。到了2005年，這三項數據分別降為11.7%、2.9%、3.0%，分別下降了1.4%、0.4%、0.8%。科技投入最高是1960年，佔GDP的3.32%，2004年祇有1.23%。無論七年來「公共財政轉型」的口號叫得多響亮，客觀數據沒有提供支持。

這是一個好信號。2006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將達到3397億元，佔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為15.3%；科技支出為716億多元，佔3.2%；社保和就業支出為1859億多元，佔8.4%。以上三項社會性支出加在一起，佔全部中央支出的比重為26.9%。「但願長進不再退」，這是人民的期許。

除了利益格局難以撼動，中國公共財政體制進程不進反退，這與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始終以「存量不動，增量調節」的方式進行有關；因其過於依賴增量資源，導致改革進展緩慢。

分析2006年中央財政預算，中央財政總支出22222億元，其中9525億元用於中央政府支出。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補助支出為12697億元，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對地方的稅收返還。這部分資金要按照來源地的屬地原則，無條件返還給地方政府，主要受益的是東部經濟發達地區。

此外，其中三分之一屬於專項轉移支付資金。1994年以來，專項轉移支付伴隨著各項改革政策出臺，種類越來越多。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先分到各部委，再逐級下撥，資金撥付和使用中形成的利益格局，使本來用於特定政策目標的專項轉移支付，逐步轉變為相關部委及地方政府固化的利益；在政策目標發生變化或不再承擔相應職責後，對應的資金安

排常常不能隨之進行調整，出現專項資金財力化的傾向。

這樣，2006年，中央用於均等化公共服務的資金，即一般性轉移支付，佔所有補助和稅收返還資金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目前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的主要來源，是2002年實施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後中央集中來的收入。中央均衡地區間公共服務的能力大小，取決於每年從所得稅分享到的增量收的多少。

截止到2005年，這部分資金規模達到1100億元。這與1995年21億元的規模相比增加不少，但絕對規模太小，限制了中央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的能力，中央能用於增量調節的資金非常有限。

李金華最近指出，2005年審計署抽查20個省市地方預算3444億元，列入地方預算，約佔中央轉移支付7733億元的44%。也就是說，中央轉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沒有納入地方財政預算，完全脫離了人大的監督，中央專支，在中國無一人能說清。

2006年，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是公共財政的題中之義。但這項政策要付諸現實，政府同樣要面臨一個問題——新農村建設的資金從何而來？

2006年全國財政支出增加4665多億元，增長13.8%，中央財政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將達3397億元，比2005年增加422億元，增長14.2%。但這些所謂用於「三農」的支出項目，包括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稅費轉移支付、農村教育衛生科技支出、農林水和氣象、扶貧、農業綜合開發等。僅僅3397億元的資金，卻要用於農村生產、政權運轉、事業發展等廣泛的領域。而據專家估算，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僅用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就需投入約五萬億元。

無論如何，2006年中央財政社會性支出比重微弱回升，是一個積極的趨向。若能以此引導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也

向這一方向轉變，意味著中國建立公共財政的進程出現歷史性進步，自1998年以來社會性支出比重下降的趨勢將隨之逆轉。

問題是，社會性支出比重上昇的態勢能否持續，取決於中國財政的分配模式能否得到改變。顯然，「存量不變，增量調節」的財政資金分配模式，已難以為各項改革與公共財政體制提供必需的資源。

所謂週期律「其興也孛焉，其亡也忽焉」；所謂黃宗義定律，稅賦減並而重返，所用非所出之害，走了57年。請聽題：我們能跳出精簡一次，增肥一圈的週期律嗎？再看城市裡全看首長「臉子」說話的「首長工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上面催逼又緊，下面搪塞應付，搞出多少金碧輝煌的豆腐渣工程。

從人心到什物無不是浮華大比拼。廣告詞裡「五百年皇家龍脈」、「公園裡的住宅，住宅裡的公園」、「不必節食的減肥妙品」、「一夜發財的秘笈」，就是過去板爺喝的「二鍋頭」也出了「皇家極品宮廷秘藏」的珍本，祇見嘩眾取寵之心，花團錦簇的旗號無不劍走偏鋒。再看，無論是烏龜王八花木果蔬烏魚蟲都要論資排輩，加官晉爵已不夠，還要封王稱帝，由豪酋而王，由王而帝，從商標到招牌無不一臉的橫氣。祇要面子，不要裡子，外表光鮮，早晚是「舊時王謝」，永遠是自己糊弄自己。

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後，大部分錢經營城市，改造城市，建高樓大廈，結果政府辦公樓一個比一個漂亮，廣場一個比一個氣派。中國地一級政府辦公樓，很多都比美國同等規模的政府辦公樓漂亮得多。這在歐美是無法辦到的，因為政府的財政收入是納稅人的錢，納稅人不支持的事情或反對的事情，輿論會鋪天蓋地，惡評會勢不可擋，國會和議會院外壓力集團可推翻政府的任何預算。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政府應當充當服務型角色，著重解決老百姓更迫切需要解決

的教育、衛生、住房、治安、司法、環保等問題。這方面美國現在做得不錯，但是在20世紀初，美國這方面也很混亂。1912年前後，當時美國弱勢群體的廣泛抗爭使新聞界廣泛揭露社會弊端，稱為「扒糞運動」，美國政府不得不下大力氣，解決社會公共產品問題，建立社會保障體制，讓每個公民都有享受基本的教育、就業、住房、醫療保險的權利和公平機會。

現在我們的政府主要精力還是在經濟發展的第一線，依然在做市場應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著如何招商引資，沒有真正承擔起政府應做、可做，而市場無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對公共需求品考慮不夠，富餘的財政收入也沒有及時向公共事業傾斜。騎白馬的不一定是王子，帶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美其名曰的「公共產品」也可能異化為向「既得利益」的強勢集團傾斜。

與2005年相比，2006年首先應該調整國民收入分配中積累與消費或者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係。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不從根本上調整這個大關係，祇是調整後面的某些關係解決不了問題。因為現在首先是大的分配關係非常不合理，如2005年我國的投資率達到了48%，按調整前的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國家統計局公報是18.2萬億元，投資為8.8萬億元。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積累，積累率已經超過50%，這在其他國家是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的。由於投資率或者說積累率太高，消費率必然就太低，分配給群眾的消費基金太少，群眾的收入水平上不去，購買力明顯不足。其結果，就必然會出現產能過剩，許多消費品賣不出去。在國內賣不出去就祇好想辦法低價出口，拿到國際上去銷售，就必然會產生很多國際貿易糾紛，產能過剩與國外越來越兇猛的外貿制裁碰頭。

國家財力不足是一個十足的偽問題。中國目前不是資金饋乏，而是資金嚴重過剩，產能嚴重過剩！以至出現「流動

性氾濫」。《瞭望新聞週刊》最近報導，中央各部委、各省廳局、地市黨政機關，甚至邊遠窮縣，各類「培訓中心」有幾萬家，一水兒的星級標準，國際水準的游泳館、網球館、保齡球館、桑拿、美容、歌舞廳等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公吃、公喝、公玩和「賬外賬」、「小金庫」，成為腐敗滋生的「溫柔富貴之鄉」。幾萬座大院、幾萬幢大樓，統統收繳上來，面向社會拍賣，就此一舉國庫可增加幾萬億公帑，建一套初級水準的全民低保體系，綽綽有餘。

三、何時實現「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東西德統一後，原東德經濟落後，居民生活水準低，原西德經濟發達，居民收入高。聯邦政府從維護統一和穩定考慮，自1991年起，向西部公民徵收總收入10%的附加稅，眾稱之為「團結稅」(Solidarta tsuchlag，口語Soli)。全部稅款用於支援原東德地區，作為包括改制重組在內的各種「統一」成本。開始祇是一種權宜之計。由於德國經濟發展十年徘徊，財政收不抵支，1995年開始改為無限期的長期稅種。「團結稅」徵收14年來，包括其他方面的財政支持，西部向東部投入的財政援助累計達1.6萬億馬克，為促進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提高居民生活水準起了重要作用，東、西部地區的居民收入水準逐漸縮小。目前，東、西部地區職工的工資差距降為10%。

法國也有兩個稅種類似於德國：一是「巨富稅」，即一個納稅人的動產和不動產總價值超過73.2萬歐元時，就必須每年繳一筆巨富稅。此舉深得民心，曾有總統候選人因主張取消這一稅種而落選；二是財產繼承或轉讓稅，如一個人在繼承直系親屬的財產超過五萬歐元時就要納稅，實行累進制，最高稅率可達50%以上。

在英國，1994年開徵了一種名為「民航乘客義務稅」，用於平衡福利支出的不足，1997年11月1日，該稅額升至每座十英鎊。1995年1月，瑞士政府也對在國內航段上的國內、國際航班徵收6.5%的增值稅。挪威也徵收乘客的國家運輸費，1995、1996、1997年曾三度提高稅額。希臘政府也在20世紀的90年代，對從國內機場起飛的乘客徵收25美元的機票稅。澳大利亞也徵收機票稅，稅額為20~27澳元。這些國家徵收的這類稅款，也是用於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

法國總統希拉克已宣佈，將從2006年初開始對民航機票增收「團結稅」。同時，致信全世界145個國家的首腦，建議在全世界實行這個計劃，援助貧困國家普及小學教育和醫治愛滋病患者，以實現聯合國《千年宣言》所承諾的，在2015年將極端貧困人口比例減半，德國、西班牙等國帶頭支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很快，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區域居民收入差距和行業職工收入差距都不斷擴大，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極為不利。那些區位條件不好的落後地區，效法東南沿海，東施效顰，缺乏競爭力，又造成對資源、環境的破壞，可謂得不償失。借鑒歐洲國家的上述做法和經驗，我國應在國家層面運用稅收槓桿調節居民收入的公平分配，這樣既能促進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又能逐漸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

最近有主流經濟學家反復宣示，認為在二元經濟結構的中國使用基尼係數之說誇大了貧富分化。奉西方經濟學為主臬、為神聖的人在分析中國貧富分化迅速擴大這個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實時，卻要「去西方化」了。但我還是要「以此之矛陷此之盾」：著名的波士頓諮詢公司（BCC）最近發佈《中國理財市場》報告稱佔人口0.5%的富有家庭擁有中國60%以上的個人財富，擁有約1.44萬億美元資產，持現

率71%，並以每年13%左右的速度發展。茅于軾先生最近也反復提出，約佔中國人口5%的三千萬人，是中國成熟的中產階級，這些富人人均資產超過50萬美元。是中國建立憲政國家的穩定基礎。這些富人的確應該發揮點穩定作用，是中國式「統籌稅」、「財產稅」的基礎。

我們可在稅收政策上，借鑒德國「團結稅」的做法，用於縮小差距的稅種可命名為「統籌稅」，實現胡總書記提出的「五統籌」。統籌稅的來源可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有關專家統計，改革以來，有近30萬億的國有資源、資產、生產要素低價轉移給暴發戶，現應向他們抽取統籌稅；二是人均收入超過全國平均水準數倍以上的城市居民；三是國家幾大壟斷行業的稅後利潤，可抽取所得稅附加。「富人寡稅」、「財富巨人，納稅侏儒」、「壟斷企業擄奪公眾福利」，這些模糊偏頗的表述，把責任歸結為富人「為富不仁」，「壟斷企業讓大眾埋單」，忘記了制度設計才具有決定性。中國沒有財產稅，才是問題的根本。統籌稅款集中在中央政府，用於援助不發達地區、貧困地區或生態功能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事業發展和社會保障基金，提高這些地區居民的收入水準和生活水準。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研究和設計「統籌稅」，儘快實施「統籌稅」。從稅務總局的統計數據可看到，中國社會保障稅負僅為0.4%左右，與發展中國家的5~8%、發達國家的8~11%左右比，堪稱全球最低。

《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人類的千年一夢，如何實現，至今茫然。為公為私都有管理者，問題出在管理者異化。但退回去，天下為私，人人見過，幾千年走下來，走不通的死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是共同富裕，彈指27年過去，富者愈來愈富，機會越來越多，社會的種種資源都向富人傾斜。學校、醫院、住宅、交通，甚至法律、媒體，包

括官員都傍上大款。人不在智，有錢則靈，社會公正的代表都成了追星一族。洞微燭隱，雖馬齒漸老，仍直言無忌，不是說洪洞縣裡沒好人，好人永遠是多數。但體制不變，光有道德號召，存在決定意識，好人幹好事難以哉。不敢講真話、不許講真話的民族毫無希望。

四、制度創新，改革和完善收支兩條線

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資助，學者高輝清等人完成的研究報告〈2004年我國租金價值5萬多億〉一文，令人明白當今背理傷道的許多弊政亟待革除。由於行政力量決定要素價格的「新雙軌制」，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不合理又找出不合法依據，有共識的12項：商品價差租金、利率差租金、進出口許可證租金、「三公」消費、政府機構灰色收入、違規使用財政資金、地方政府支持的企業偷稅、壟斷行業形成的壟斷高收入、教育租金，總計54952.9億元。佔當年GDP的34%，相當1.7個財政。這裡還沒算上國有資產流失、醫療保障缺失、鐵路、交通、航空、證券、保險等壟斷租金。租金的存在，為腐敗尋租提供溫床。

河南省鞏義市一車主張建勳，過陝西潼關被工商行政管理人員非法罰款2.7萬元，不堪重負，回家後服毒自盡。這祇是冰山一角，此類事情，全國甚多，於今為烈。有學者言：根本上是由財政體制改革中所謂的收支兩條線、實際下達收罰任務、超收獎勵、罰款分成體制以及財政收入中央比重越來越高導致的。有人提出徹底廢除「收支兩條線」。我提出改革和完善收支兩條線，如果收支一條線，就是陳良宇管理的上海，問題會更多，更嚇人，從根本上失去了監督。

目前中國政府各種部門、單位，除正規的政府行政機關，經費來源五花八門，形形色色。

何謂財政的「收支兩條線」改革呢？以前財政以經費不足為由，許多政府的機構，包括行政性事業單位，可以設立機構，可以增加職員，但是，其經費由於財政不撥款，要通過自收自支來解決。工商、質檢等基層部門是典型的此類機構。後來隨著個體戶和企業的增加，財政部門發現，它們收的費和罰的款，比它們需要的支出要多得多，再加上自收自支中私分、亂支、挪用和貪污問題較多，於是，進行了所謂的收支兩條線改革：即收費和罰款先交上來，再由財政撥下去。這似乎杜絕了一些問題。然而，由此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在這種體制下，幾乎沒有一個政府部門不收費。中國2005年進入收支兩條線的各種收款為五千多億元，自收自支的估計還有五千多億元，GDP的負擔率高達30%以上，為發展中國家之最。舉一小例，2005年北京市的交通罰款就超過十億元。政府各部門繁多的收費罰款，已經成為擾亂經濟秩序、破壞社會和諧的一大公害。

這種體制實際上給中國的企業經營、創業和就業等造成了重創。中國目前資本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技術的企業稅費負擔較輕，外資企業的稅費負擔更輕。而勞動密集型的微型和中小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先要繳17%的增值稅，再要繳33%的所得稅，還要繳營業、教育、城建等附加稅，在分紅時還要繳一筆個人所得稅，再加上政府各部門的收費和罰款，已不堪重負。另外因辦事越來越難，還要有公關費用，創業和經營環境可以說是世界上比較嚴酷的。企業因不堪稅收重負，以及政府工商、質檢、城管、交通、交警等部門的亂收亂罰，1999~2004年中國個體工商戶淨減少770萬個，每年破產128萬個；2005年一年，法人企業淨關閉30.1萬家；如果按照一個個體戶平均二個勞動力就業、一個企業平均就業十個勞動力計算，因政府各部門收費罰款而減少的就業崗位高達1840萬個，這就是中國公路、電站、煉油廠、政府機關等大樓、廣場等推動經濟高速增長，

而失業者越來越多，就業越來越困難的最重要原因。

這種體制將原來許多不合理的政府收費合法化了，再加上超收獎勵和罰款分成，使實行這種體制的一些政府機構和行政性事業單位，有了一種制度設計上的激勵。使得政府一些部門和行政收費性事業單位，想方設法、千方百計、巧立名目、瘋狂收費，利用公權，公然設租尋租。

不受制約和監督的權力主體和權力的市場化，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造成了整體的腐敗機制。一是這些實行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體制的單位及人員，一般福利和收入比政府的如信訪局等單位及公務員高得多。曾有報道，某省靠公路收費的收費員，不算獎金，一月工資高達八千元。二是由於許多收費和罰款的部門自由裁量權太大，並且罰款的最低額與最高額之間空間也太大，於是一些執法部門和公務員，先開一個最高價，再罰一個低價，從中撈取好處。比如陝西潼關的工商局張建勳案，就先開了一個五萬的價，再從中尋求個人的好處，把上交國庫的罰款金額降為2.7萬元，並且常常收了錢後不開發票，私分罰款。因此，這種體制為公務員公權尋租創造了最有利的機制。三是按照現行的制度，這些收費和罰款不進入各級財政向人大報告的預算，因此，大量的公車、吃喝、出國等開支是從這筆預算外收入中支出的。有學者計算，三項費用高達九千億。有關部門官員迷惑不解，說預算內公車、吃喝、出國祇花了一千多億。把預算外收支和由企業和辦案當事人報銷的加起來，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是九千億，而不是一千多億！筆者2005年到巴西、南非，與十年前出國如換了人間，刮目相看，所有的景點都是口操漢語的黃皮膚，一直到真正的「天涯海角」好望角，一位中國官員感歎：「好像是在中國的景點，偶而來幾個外賓」。

這種體制將行政與利益、執法與收費相結合，使執法的公正性南轅北轍，欲益反損。執法部門收了錢，就成了保

護傘。實際上一些執法部門，在收了錢後，不管是真貨，還是假貨，大多都放行。合法經營的加大了成本，違法經營的由工商、質檢、城管等部門放行而危害社會。比如，曾經報道過的毒奶粉、毒火腿、毒粉絲、毒大米、黑棉花及各種假藥等等，都曾是基層一些工商、質檢、藥監部門收錢後放行的。實際上這種執法和收錢密切相連的體制，將基層的一些工商、質檢、藥監、城管等部門變成了假冒偽劣等違法者的保駕護航者。

最近，李曙光撰文指出，1982年，全國老百姓的上訪數量是二萬起左右。2005年，全國上訪數量達到三千萬起，增加1500倍。歌舞陞平與群起而攻，經濟奇蹟與社會亂局，高速發展與信仰危機，燈紅酒綠與道德底線並存。老百姓總想分享繁榮的廣場效應不一定對。但財政剛性之僵局，使「公共財政」准橘成枳，如不主動改革，必然是被動的「清算結局」。

除了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體制外，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係不平衡，也是將地方政府各部門和行政性事業單位逐良為娼的體制原因。2004年，中央財政收入佔總財政收入的比例已經達到了57.2%。從歷史上看，自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以來，11年的時間裡，中央財政收入比例上昇相當快，從22%上昇到了57.2%。相比之下，地方收入比例逐年下降。到目前，需要以40%多的財政收入，支付70%的事權。這樣，一是使得省一級財政，將工商、質檢、藥監等省直管的部門，往往被當成財政創收的系統，下任務、定指標，給獎勵，讓這些部門為增加省財政做貢獻。全國工商、質檢和藥監等部門收費和罰款2005年估計超過一千億元，公檢法司不足的辦案經費，社會保障部門、各種監事會、社會稽查部門、社會文化機構、慈善機構、行業協會、商會、科教文衛，林林總總，收費更是天文數字。二是使得市地縣級政府和財政，一方面想方設法低價征地，

高價賣地，將農民的一部分利益和通過消費者高價買房利益拿來補充財政；另一方面給所屬的城管、交通、交警、消防、市政等部門也下達收費罰款任務，彌補財政不足。一般土地收入和收費罰款等預算外收入，要佔到市地縣兩級財政的50%。全國從個體經營戶、微型和中小企業身上收來的收費和罰款，估計超過三千億。

亂收錢一定亂花錢，亂花錢一定污染社會風氣。中國的事辦不好，都是錢多了用不好惹的禍。1994年稅改之前，稅收總量祇有四千多億元，2005年超過了三萬億，2006年增加七千億不在話下。但是，錢越多越不夠用，軟硬赤字肯定又要列支大幾千億元，不信就騎驢看唱本。

現在的領導大概多出於工程師，工程搞多了，什麼都是「系統工程」，以為學術、藝術創造也和工程一樣，可以規劃出來，立項、設機構、招投標，大把撒銀子堆出成果來，動不動千軍萬馬修長城。二十四史設衙門，養一班人官修，再修也修不出司馬遷的發憤之作《史記》。現在一部清史工程撥款數億元，還有數不清的大師工程、學術帶頭人工程。學術、藝術、基礎理論研究是個人的創造性工作，不是養雞場可以批量生產，更別提生產「大師」了。

亂花錢成了潛規則，誰浪費誰致富。做為社會良心的出版社，不准賣書號是明令，還在賣書號是公行，明令與公行並行不悖，上面明令禁止，下面合作出版，需求創造市場。學者要想出名，先要在電視媒體混個臉熟，再掛上幾個頭銜，有了錢再主編幾套叢書，便成泰山北斗。媒體包裝的經濟學家再當上幾家大公司的獨董，就完成了資本的經濟學家化和經濟學家的資本化。

有錢能使鬼推磨。至於用的什麼磨？推出的什麼米？一切由市場價格決定。當年搓背、修腳、泡澡堂，都是清淡夕陽產業。「忽如一夜春風來」，桑拿、按摩、捏足、洗頭，「一夜好風春遍栽」，變成火爆中國的「朝陽產業」。

當年資本主義的標識：專飼貓狗的罐頭在中國已稀鬆平常；「過剩」的好牛奶被傾倒，早不是什麼新聞，毒奶、毒米、黑棉花見怪不怪，寵物醫院看病比人貴也沒人義憤填膺了。中央德政、善政願望，到了下面馬上全成狗咬尾巴亂花錢的怪圈。你提出新農村建設，我就搞圈地運動，你提倡紅色旅遊，我就度支公款。關係到40~50%嬰兒嚴重貧血、大腦發育遲緩的鐵醬油，每人每月鐵醬油祇要五角錢，說了多年無人理睬。毫無用處的各種「補品」，因為價格離譜，廣告鋪天蓋地。

五、廉價又廉政的政府要靠制度創新

需要我們思考的是，目前的這種行政與利益相結合、執法和收費密切相連，包括中央與地方財政極不平衡的財政體制，其運行的結果，是以自己利益為本，執政為錢。而且也不符合國際上通行的現代政府標準的起碼要求。首先，應當建立人民~人大~政府之間的收費罰款制約機制。政府、政府各部門及授權的行政性事業單位，不應該有收費權，其一切關於收費的條款的設立權，應當上收到省和省以上的人大。任何收費和罰款項目、標準、方式，都必需經過人大討論、社會聽證等程序設立，否則應當視為違法。

其次，徹底清理工商、質檢、藥監、城管、建設、交通等各部門的行政性收費項目，超收獎勵、罰款分成，收費、罰款體制一律廢除，這些執法部門全額經費由稅收形成的財政供養起來。1999年我在〈你給我合理的稅制，我給你廉價又廉政的政府〉一文中就提出「績效預算」，並提出執法部門首先應在人大監督下執行「績效預算」。1998年美國國內收入局績效預算不合格，限期整改就是成功案例。

再次，將行政和事業單位的行政公務活動與市場服務性

事業分開。凡是政府執法部門自己執法、檢查發生的費用，是行政公務成本，應當由執法者承擔，而不應當由被執法者支付。比如，政府工商管理管理和質量技術管理部門，要檢查某一產品是不是合格，其發生的檢查費用，應當由財政經費支付，而不應當由接受檢查的商戶承擔。如果是商戶和自然人，要求工商、質檢等部門的事業單位對其商品、包裝等進行檢測，這類市場服務性的費用由提出要求的客戶承擔。有利的一哄而上，都來管；無利的，真正應當管理、服務的，誰都不積極。

儘快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係。中央適度集中財力並沒有錯，關鍵是聚財為國，用財為民。界定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對稱。調整和劃分稅種，開徵消費稅，全額留給省級財政；開徵房產稅，全額留給市地縣鎮級財政，撤銷鄉鎮財政，取消市管縣財政體制；政府項目建設資金由發行債券籌資解決，財政科目中列本息支出項目。如果，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稅關係不進行調整，地方政府各部門和各行政性事業單位收費和罰款「搶劫」自然人和法人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扭轉。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在波瀾不驚、有條不紊之中，以增值稅代替承包制，釜底抽薪，實現了中央集中財力這一石破天驚的變化。但分稅制並未真正建立，而是分成制、分錢制。增值稅也因改革不徹底，留下了許多「制度陷阱」。

總之，政府各部門究竟是以錢為本，還是以人為本，政府各執法部門究竟是執政為民，還是執政為權，政府各行政部門和各行政性事業單位究竟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重，還是以部門權力和部門利益為重。經濟人假設不適合政府部門，關鍵在於能不能行政與利益相分離，執法與收費徹底分開，關鍵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稅關係能不能得到調整，關鍵是財政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的體制和下達創收指標和任務潛規則能不能被廢除！

行政產業化，執法市場化：一，由於行政權力成為利益的主體，公共政策甚至改革措施往往成為甩財政包袱，或者與民爭利的手段；二，對體制弊端的改革往往會演化為對既得利益群體錦上添花的措施。比如國有企業的拍賣，國有資產的出讓；三，調控強勢群體的政策措施難以出臺和實施。比如財產稅、物業稅、遺產稅等；四，改革措施在實施過程當中的走樣變形。從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分析，在目前資本收益格局中，國家佔26%，居民個人佔22%，財產分配不平等，高於收入分配不平等。早在2002年，城市金融資產總值中，20%家庭佔有66.4%，其餘80%家庭佔33.6%，其中金融資產最少的20%家庭僅佔1.3%（見張曉晶報告）。而我國外向型經濟卻十分畸形，高技術產業實際很脆弱。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由1995年的101億美元，躍至2005年的2183億美元，增速驚人。但三資企業出口佔88%，是跨國公司把生產基地搬到中國的反諷。黨中央提出，要更加重視公平。我國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有許多不公平，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一方面，上訪與維權之人呈幾何級數增長，從鄉縣市省一路上訪到北京，還是傳統的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京城成為為民作主的最後希望；中國百姓多數除通過找「青天大老爺」仍是別無長策。而關心民瘼的官員又太少。剛剛有點現代意識的維權者對誰拖欠你的工資，克扣你的獎金，罔顧你的死活，無視你的安全，方興未艾小荷才露：僱律師、上法院、打官司、找記者、媒體曝曝光。然而，與多數上訪者一樣，弱勢者告強勢者，除少數機緣巧合都是雞蛋碰石頭，找碎瓦。歷代都說「天下訟息，是盛世景象」，可惜我沒見到。但古有名訓：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另一方面，反腐敗的呼聲越來越高，連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都法辦了，不可謂力度不大。然而，法紀森嚴，依然有漏網吞舟之魚，制度嚴密，亦有百密一疏之處；貪腐的數

額越來越大，前赴後繼，令人咋舌。腐敗發展為明碼標價，賣官鬻爵，禍國殃民，官可賣，還講什麼操守廉恥！腐敗之淵藪，覆亡之資訊，筆端盡在此了。賣官古已有之，秦漢就有納粟拜爵，但古代賣官還有皇帝詔令，從原則上講，錢也入官庫。如今是上下其手，私相授受，錢入私囊。社會各種腐敗醜陋現象 20 年目睹之怪狀，好像都無根治之策，若能根治，實是生民之福，社稷之幸。遠的學不了，都是華人世界，香港的廉署，新加坡的人民資本主義總能學吧？

六、社會的主要矛盾：狐狸分餅

官產學媒的主流認為，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公共產品的需求與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矛盾，對老百姓欠賬太多的認識是對的，但由此演繹為主要矛盾是顛因為果。如果要說中國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黨中央的新政取向已很明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和立黨為私、執政為權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非和諧社會的矛盾；五統籌與非五統籌的矛盾；新「三民主義」與利益集團壟斷財富的矛盾。一句話，科學發展觀與非科學發展觀的矛盾。發展是硬道理，但發展的制度安排並不是沒頭蒼蠅。

社會財富增長快，為什麼國富民不安，民富國不強，盛世不太平？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表明，2005 年中國 GDP 總量達 22257 億美元，這還是按匯率標準，若按購買力標準，中國的 GDP 早就超過日本，世界第二。自 1979 年以來，GDP 以每年 9.6% 的速度增長。據官方的數字表明，2005 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約為三萬億元，比 1978 年增長了約 28 倍。同期中國人口從 1979 年的 9.7 億增加到 2005 年的 13 億，人口自然增長率從 1979 年的 11.61‰ 下降到 2005 年的 5.89‰。以往由國家負擔的城鎮居民住房和就業人口的醫療、教育等

包袱已甩掉。20多年沒有發生戰爭和嚴重的自然災害。這都表明，改革開放近30年來，國家經濟實力大為增強，是歷史最好時期。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構成公共品生產的首要條件。

而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原因是非生產性支出和投資比重過大。據《證券時報》2006年2月9日的一篇文章披露：中國財政支出中最容易膨脹的部分是行政公務支出和直接投資，中國行政公務支出和直接投資佔財政總支出近50%，而美國僅佔17%。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事關公民切實利益的部分，成為中國財政支出中最不容易膨脹的部分，祇佔財政總支出的25%，而美國則佔75%。2005年，中國政府機構的行政管理費用約七千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140倍多；行政管理費所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從1978年的4%上昇到今天的24%。而在國外，行政管理費一般祇佔財政收入的3~6%。全國政協常委任玉玲在「兩會」上也指出：「我國的行政管理經費增長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達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從1978~2003年的2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已增長87倍。行政管理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僅為4.71%，到2003年上昇到19.03%，這個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美國的9.9%大大高出，而每年還在以23%的速度大幅增長。」統計口徑雖有差異，結論是一致的。

腐敗造就了制度成本巨大。國內報端不時披露，豪華辦公樓，越蓋越多；公務員超編，冗員難減；公款送禮，屢禁不止。所耗費用不僅遠遠超過軍費開支，更比教育和醫療經費加起來還要多。《財經》雜誌披露，2004年中國藥監局受理了10009種新藥申請，美國FDA（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僅受理了148種。《南方週末》登載〈「萬種新藥」背後的誘惑〉一文指出：國家藥監局每年受理的「萬種新藥」當中，絕大部分屬於各種仿製藥，乃至改變劑型等改頭換面

的所謂「新藥」。例如，一種核心成份為青黴素的感冒藥針劑，成本僅六角錢，加入一點其他藥品成份後，價格狂升到150到600元；中國製藥企業熱衷於申報「新藥」，因為一旦拿到新藥批號，企業可以自行定價，賣個好價錢。市場疲軟，突然驚現公共品不足，並以此認為中國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匱乏。揭開表象，發現了利益集團對社會財富的壟斷，即對公共品的巧取豪奪，才是制度性腐敗的深層原因。

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取消農業稅給中國九億農民帶來的好處，早已被這兩年的化肥、農藥、柴油、薄膜、種籽等農用生產資料漲價所抵消。中國社科院2005年的調查分析，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資本貢獻率為28%，技術進步和效率提昇僅3%，而勞動力的貢獻率為69%。「上下交爭利而國危」。關鍵是改變比較優勢，國家集中一切人財物的優勢，進行核心技術的「趕超戰略」。這是「國計」，而對待「民生」祇能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祇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而現實是，在利益導向下，一些由國家辦的執行義務教育的小學和中學嫁接了私校，成為「校中校」、「名校辦民校」，接通了公共品變成私人品的管道，巧立名目地亂收費，這樣發展下去，不要幾年，公共品變成私人品，學費大幅度的提高不言而喻。與此同時，許多主流學者認為，高等教育、職業教育、遠程教育等如果也是公共品，既不符現實需要，也不具備國家財力的保障。這些教育應是個人對未來前途的投資，是充滿競爭性、排他性的金字塔塔尖，即私人品。表面看，大理不虧。但在西方，哈佛、劍橋都有名人的孩子，巨富的孩子通過各種基金，成績不好也能就讀名牌大學。如果我們不承認大學的「半公共產品」性質，那麼，普通工人、農民的孩子無論如何學而優金榜提名，由於沒錢也與名校無緣。無怪乎那麼多白衣天使變成了黑心惡魔，靈魂

工程師成為公關交際花。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不再罵娘」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少，學校、醫院、研究所再不是被金錢遺忘的角落。因為這些人，沒功夫發牢騷磨嘴皮子了，大環境使許多人，不腐敗都不好意思，懂得抓緊時機，充分利用或熟練應用所掌握的資源或權力進行交換，哪怕他祇是一個小小的辦事員或大衙門裡的小門房。醫生用收取病患的「紅包」或使用新藥的「回扣」去支付孩子高昂的學費，老師和教授們去醫院看感冒要做名目繁多的檢查，花了幾百元醫藥費。招標立項斂錢收租分紅走穴的一流們，與時俯仰，人見人愛，也可和款、腕、星比肩。極而言之，最近幾年中央黨校老闆班火爆，60多期培訓了近萬名老闆。老闆們為了「充電」，總結得也精闢：「中央黨校為學員與領導、學員與專家搭建了溝通的平臺，不勝榮幸。」而弱勢群體，如剛剛得到免除農業稅好處的農民，還未來得及從免稅喜悅的酒醉狀態中清醒，勝利的果實，已被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新一輪狂漲吃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成因又是電、煤、原油、運輸等價格的上昇，生產和掌握這些資源的大多是國有企業，為了自身利益，毫不猶豫地把漲價的因素轉移出去，最終落在九億農民身上。因為壟斷企業的產品銷售價格不由市場決定，由壟斷企業自定。

國際原油價格上漲，並沒有削薄中國石油巨頭的利潤：中國三大石油巨頭公佈的企業半年報顯示：2005年上半年，中石化在叫苦聲中狂賺180億元，比2004年同期增長20%；中石油的淨利潤為616億元，比中石化的180億元高出三倍多，中海油的淨利潤為118億元。

國有壟斷之罪，提法很煽情，但卻是誤導。面向世界，石油、鐵礦砂都供大於求，而價格卻翻著瘋狂的跟頭，有如烈馬脫韁，一路成倍上漲。再精明的經濟學家，也畫不出一條符合市場規律的成本效益曲線圖。現貨跟著期貨走，期貨

跟著投機走，投機基金集中在美國，本質上是美老大說了算，別說中國沒有定價權，歐盟也眼看著美國2.1美元成本的國內石油封存不採高價進口，美國大石油公司利潤豐厚。壟斷並不可怕，怕的是利益集團火中取栗，強者通吃。以壟斷之矛對壟斷之盾，將超額壟斷利潤、超額稅收貢獻給人民，就功德無量，什麼錯都沒有。問題是，在這裡，社會公平、正義、平等普世價值早已擯棄出局，只剩下赤裸裸的掠奪和交易。社會機體的腐敗越過個體的局部範圍，越演越烈，漸入膏肓。

用不著抖學問、掉書袋、賣弄理論，也用不著旁徵博引，細密考據。我提供的基本數據如鐵鑄事實，使我可以直抒胸懷，直白、痛快地告訴讀者，這28年來，公平如擠牙膏，富人一碗等於窮人一鍋，都是狐狸分餅惹的禍。誰看了這些鐵鑄一般分配潛規則能不怦然心動，熱血上湧，有如大夢初醒。

歷史很新也很舊。狐狸給兩個小熊分餅，一塊大餅分兩半，左一口右一口，為了「公平」左右開弓不斷啃下去，最後看似公平了，大頭已落入狐狸的肚中。我們也知道《一僕二主》的故事，由於兩個主人祇能依靠一個僕人，最後的結果是僕人異化為真正的主人。好壞人的故事，講了千百年，不僅小孩愛聽，大人也愛聽。「郎顧之爭」顧離軍入獄，故事本已劃上暫時的句號。郎咸平沒完沒了，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正因為他是香港小孩，才敢來大陸說出實話，不用學成年人必須指鹿為馬才能被皇帝放過。郎咸平意猶未盡畫蛇添足，最近又講了一句「中國的世界工廠，比資本主義的工廠更血汗」，馬上就有理論權威深揭猛批，上綱上線，一言以蔽之，這種反思改革開放就是否認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是硬道理裡面的硬道理，管著所有的軟道理！義正辭嚴的批判，讓人產生錯覺，好像郎咸平是散佈自由化精神污染的黨政幹部。結果，郎小孩告饒說得好：「我學的是

資本主義經濟學，工作在資本主義社會，我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從事的是會計師的審計評估，如今，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也沒有人敢像中國這樣化公為私，敢像中國這樣剝奪工人。」

權威批郎，向風車舉劍而所向披靡。祇是選錯了對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不是主流經濟學家的定義：市場經濟＋社會公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整個邏輯展開的前提。小平同志的經典語言：2049年之前，中國都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將來富裕了，解決兩極分化，比改革開放更困難。我的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決不是垃圾桶，什麼資本主義的東西都可往裡裝，而是要駕馭、領導那些不得不存在的資本主義。首先要解決誰領導？為了誰？真共產黨領導，真為人民服務，玩真格兒的。「公有制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主導」，也決不是一句空話。國民黨跑到臺灣之後，資本主義在臺灣也曾有「四小龍」之首的輝煌局面，但邏輯前提是依附美國。共產黨人領導13億中國人民的制度安排，大是大非，大本大源，是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作為後發型國家，不作帝國主義的附庸，又沒有當帝國主義的身板，資本主義的路在中國就走不遠，走不通。祇有共產黨人信仰無比堅定，才能領導13億人民共同富裕。有了我們這樣的稅收局面，才有可能出現2006年，中央財政支持「三農」的資金3394億元。建設新農村僅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就需要五萬億人民幣。

世界上農業最成功的美國，也離不開國家的財政補貼。與工業比，農業本來就是弱勢產業。沒有我們這種財力的迅猛發展，根本不可能有新農村建設和新型的城市化發展。祇有中國式的財力集中，才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讓中國的弱勢群體每年增加一萬億人民幣的內需。多希望這一天早點到來，金仁慶曾預言中國2010年財政可達到三萬億元，實踐卻提前五年！中國的「弱勢群體」哪怕種草種樹，生態環保

型生產，科教文衛服務型生產，基礎設施建設，架橋鋪路，公共產品型生產，他們生產出的GDP肯定是綠色GDP，他們的消費肯定是資源節約型消費，節能、節水、節電、小戶型居住。他們的子女接受教育多數也是職業技能型教育。他們的內需上去了，中國經濟畸形外向的病態才能夠改變。偉大的復興計劃，祇有靠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並使用另一手，國家集中財力，計劃大力推動。祇靠市場經濟，在中國解決不了充分就業問題，相反，大量存在的產業後備軍，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前提。

最近，溫鐵軍、林毅夫撰文認為，勞動力作為過剩生產要素，打工者每年每人給城市提供大約二萬元人力資本的貢獻，佔經濟發展的50%以上。這種比較優勢理論，與樊綱近期提出的非民粹主義增長，共同構建了完整的邏輯。當年馬克思批判薩伊資本帶來利潤、土地帶來地租、勞動帶來工資的庸俗經濟學。我們也清楚，這種鼓吹資本奴役勞力的庸俗經濟學，在今天的中國不僅不可避免，還有用有效。但知道資本對勞動的奴役，而樂此不疲地鼓吹這比較優勢、比較成本者，就是資本的奴才了。國務院研究室近期發佈了《中國農民工調查報告》，農民工共二億多人（包括鄉企），人均工資300~800元的佔72%，僅相當城市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四千萬農民失地、失業、失去最後的社會保障。許多城市都明確提出：吃飯靠財政，發展靠土地，「經營城市就是經營土地」，土地已變成第二財政。「中國的比較優勢」對資本具有擋不住的誘惑，經濟學家津津樂道不斷鼓吹的比較優勢，也是哈耶克的同行口口聲聲所要的「騙出一個好制度」。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現實之中，本來就不是二律背反、非此即彼的。可怕的是，共產黨領導、允許的某些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由於共產黨人自己沒有清醒的認識，不但不能領導和駕馭資本主義，反而自己從半推半就到

投懷送抱，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演變成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演變成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原始、醜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要正視在這個拐點上，官、產、學、媒不可避免的會結成某種神聖同盟，與國外大型跨國公司相結合，代表強勢利益集團，蹂躪弱勢群體，使改革開放變成強勢集團的話語權。更可怕的是理論的嚴重滯後。今天的許多提法，還趕不上列寧、毛澤東、劉少奇他們的許多科學假說，具有邏輯的一貫性，實踐的徹底性。最近讀劉源的《劉少奇與新中國》，建國初狠抓「國計」，放活民生，目標是求真務實，強國富民。「惟大英雄能本色，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不是和稀泥，是左右開弓的「兩手都要硬」。「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我們獻身改革開放，不是向帝國主義和資本家投降；我們參與撥亂反正，不是返回蔣家王朝、美帝慣例，而是重返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正；我們倡導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昨天的初衷，今天的目的，始終一貫，都是要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方向。恐怕還真有人會撿回文革的口號和大棒。我們今天的「左傾」，是為了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繼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在「左」的方向上防止重演文革悲劇，在「右」的方向上避免重蹈蘇聯東歐解體易幟的大災難！⁵

超越「左」、「右」，實說實話，人微言輕，藉兩首古詩結束。一首是明末陳恭尹的《讀秦記》：「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黃石公傳張良《素書》而助劉邦成霸業。一首是王漁洋讀《聊齋誌異》：「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孤墳鬼唱詩。」人間不講人話真話，有情有義的真話反而要藉「鬼狐」而言之。

註釋：

- ¹ 參看馬克斯：《哥達綱領批判》。
- ² 參看《列寧全集》第33卷，第248頁。
- ³ 參看《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73~323頁。轉引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第288頁。
- ⁴ 參看《鄧小平與鄧肯的談話》。
- ⁵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第4~10頁。